

序 言

2026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國¹ 建交 77 周年。在這 77 年間，兩國關係經歷了從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兄弟合作，到意識形態對立與疏離，再到如今以睦鄰友好為主流的曲折演變。然而，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裏，中蒙之間的相互了解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迄今為止，幾乎無人能夠給出準確而全面的回答。這一現狀，與兩國長期近鄰的身份遠不相稱。這種認知的匱乏，既是歷史的投影，也是現實交往中的缺憾，它促使我們回溯兩國關係的原點，從那些被塵封的往事中尋找理解當下的線索。

「蒙古」一詞在不同時代有着不同的含義。對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大蒙古帝國」與「外蒙古」這兩個稱謂印象尤為深刻。前者指向一段橫跨歐亞的輝煌帝國記憶，後者則承載着 20 世紀地緣政治的裂變與傷痛。儘管時代變遷，「蒙古」依然在公眾視野中佔據一席之地，相關問題持續引發廣泛關注。高校中許多同事和朋友時常向我問及蒙古，諸如：「有沒有去過『外蒙古』？」「『外蒙古』經濟發達嗎？」「『外蒙古』國民的生活習俗與內蒙古的蒙古族有何差異？」他們口中所稱的「外蒙古」，實則指今日的蒙古國，這不過是一種習慣性沿用舊稱而已。然而，這種稱謂的沿用本身，便折射出一種複雜的歷史心結——它既是地理概念的慣性延續，也暗含着對一段尚未遠去的歷史的集體記憶。

1 清朝時期依歸附時間先後、地理方位（漠南／漠北）及統治制度差異，官方初稱「內札薩克蒙古」與「外札薩克蒙古」或稱為「漠南蒙古」與「漠北蒙古」；清末漸演變為「內蒙古」與「外蒙古」。1924 年，外蒙古當局宣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1946 年 1 月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92 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更改國號為蒙古國。為行文統一，文中「蒙」「蒙古」，如無特殊說明，均指蒙古人民共和國。

實際上，儘管內蒙古的蒙古族與蒙古國的蒙古人同根同源，二者却不能簡單類比。內蒙古的蒙古族長期浸潤於中原文化，逐漸與之融合，在語言、習俗、社會制度等方面形成了獨特的區域特徵；蒙古國的蒙古人則更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在文字改革、社會轉型和價值觀念上趨於西化。由於所接受的文化影響迥異，彼此間的差異日益擴大。事實上，就連內蒙古的大多數蒙古族對蒙古國的情況也了解有限。因此，中國人對蒙古的認知整體上相對有限，或者可以說，他們對蒙古抱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情感。所謂「熟悉」，源於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族源紐帶；所謂「陌生」，則來自數十年來政治分隔與文化分流所造就的現實差異。

普通蒙古國民對中國的了解則更為有限。2016 年，筆者在蒙古國國立大學留學期間，曾對該校學生及烏蘭巴托市民進行過一次調查。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被問及中國與蒙古哪一國領土面積更大時，多數受訪者竟回答「蒙古比中國大」。無奈之下，筆者只得取出手機展示世界地圖。當看到真相時，他們無不露出驚訝與困惑的神情。這一細節雖小，却深刻揭示了中蒙兩國民眾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兩個毗鄰而居的民族對彼此的基本認知尚且如此模糊，遑論對彼此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的深入理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尤其是在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之後，中國在該陣營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為加強與周邊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不斷擴大對其影響。向蘇聯、蒙古、朝鮮、越南等國家派遣大量中國專家和援建工人，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拓展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之一。這種以人力資本輸出為主要形式的對外援助，既是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精神的體現，也是中國在冷戰格局中爭取戰略空間的手段。

中國向國外大規模派遣顧問、專家和援建工人的歷史相當長久，從建國初期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影響範圍極為廣泛。最初，這些派遣活動主要集中在周邊的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蒙古、朝鮮和越南，隨後才逐漸擴展到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政府向周邊社

會主義國家大批派遣技術專家和援建工人，這是其擴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影響力的重要舉措。這一問題，也因此成為研究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史的關鍵課題。

本書旨在專門考察 1949 年至 1964 年間中國向蒙古派遣援建工人的歷史。在回顧中蒙建交 77 年歷程之際，選擇「中國工人赴蒙援建」作為研究課題，在於這一時段跨度較長，覆蓋了從中蒙建交、友好關係確立直至關係交惡的完整周期。從 1949 年兩國建交時的謹慎試探，到 1950 年代中期合作漸入佳境，再到 1960 年代初期急轉直下，短短十五年間，中蒙關係經歷了從升溫到破裂的全過程。因此，通過這一課題，可以大致勾勒出中蒙兩國及兩黨關係演變的過程與主要特徵。援建工人如同一枚歷史的探針，深入兩國關係的肌理，使那些隱藏在政治話語之下的真實脈絡得以顯現。

不僅如此，國內外學者尤為關注中國對蒙古援助的內在動機，即如何通過輸出中國革命思想與經濟發展模式，來削弱蘇聯在蒙古的影響力。這一問題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關涉到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競爭的複雜圖景。然而，目前中蒙學術界對「中國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狀況」這一課題的研究仍較為薄弱。這種薄弱不僅體現在成果數量上，更體現在研究視角的單一和史料運用的侷限上。基於此，筆者將以蒙古國檔案為基礎，輔以中國和俄羅斯的相關檔案，對這一課題進行深入探究。本書以在蒙的中國援建工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探討兩國基層民眾之間的互動，進一步梳理中蒙關係發展的脈絡。將目光從高層政治決策下移至普通勞動者的日常生活，有助於我們在宏大敘事之外，捕捉到歷史的細微肌理和人性溫度。

作為普通人的中國援建工人，受政府派遣前往周邊社會主義國家，協助當地經濟建設，履行國家賦予的政治任務。他們來自中國各地的工廠、農村和建築工地，許多人出發前甚至不清楚蒙古的具體方位，更不了解自己即將面臨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在此過程中，他們不僅要與當地群眾建立友好關係，也不免會與蒙古群眾和工人產生矛盾與衝突。因此，筆者希望通過這一研究，探索並回答以下問題：中國援建工人與蒙古當地民眾之間的關係，是否影響了中蒙兩國的決策？抑或中蒙雙方的決策反過來塑造了工人間的關

係？或許，二者互為因果，相互影響。這種國家行為與個體命運之間的複雜互動，正是本書試圖揭示的核心命題。

從現實意義來看，中蒙雙方正積極加強溝通，推動高層互訪。近十餘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先後訪問蒙古，同蒙古高層領導人舉行會晤，進一步鞏固了兩國間的合作關係。2015 年，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秉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理念，着力推動與蒙古的全方位互利共贏合作，深化「一帶一路」倡議與蒙古「發展之路」戰略的對接。如此，為中蒙關係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也為兩國經貿合作開闢了廣闊空間。

近年來，中蒙兩國高層交往日益頻繁，務實合作不斷深化。2023 年 2 月 14 日，蒙古國總統烏·呼日勒蘇赫視察了新扎門烏德口岸物流中心的運行情況，該物流中心是中蒙聯合實施的基礎設施改造項目之一，其建成運營標誌着兩國口岸合作進入新階段。6 月 26 日至 30 日，蒙古國總理魯·奧雲額爾登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其間參觀了天津港運行情況，並出席在天津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此次訪問不僅深化了兩國在物流與港口領域的合作，也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中蒙共同致力於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信號。9 月 6 日至 10 日，第四屆中蒙博覽會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舉辦，其間舉行了 20 餘場經貿活動，簽署了涉及新材料、化工、裝備製造等領域的項目協議逾 200 個。西伯庫倫—策克方向鐵路建設工程的啟動，標誌着中蒙兩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一步加強，這條鐵路將成為連接中國西北與蒙古南部資源富集區的重要通道。10 月 17 日至 20 日，蒙古國總統烏·呼日勒蘇赫出席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與中國領導人就深化雙邊關係與區域合作達成廣泛共識。

2024 年以來，中蒙關係繼續保持穩步發展勢頭。雙方在能源、礦產、交通等傳統合作領域取得新進展，同時在綠色發展、數字經濟、醫療衛生等新興領域的合作也逐步展開。中方積極支持蒙古實施「遠景 2050」長期發展戰略，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防治荒漠化、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協作日益密

切。人文交流方面，兩國互派留學生規模持續擴大，漢語教學在蒙古取得長足發展，蒙古文化在華影響力也在逐步提升。2025年9月，蒙古國總統烏·呼日勒蘇赫應邀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活動，雙方簽署了海關、計量、媒體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雙邊關係由此取得更多成果。蒙古作為上合組織觀察員國，其參與程度的加深，不僅拓展了中蒙合作的多邊平台，也為地區安全與合作機制的完善注入了新動力。

這些重要事件展示了中蒙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的緊密合作與交流，為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今日的中蒙關係建立在更為平等、務實和多元的基礎之上，兩國都在努力擺脫冷戰思維的桎梏，探索符合各自國家利益的相處之道。

近年來，中國對蒙古的援助項目不斷增加。例如，2016年建成的額爾登特自備電廠完全採用「中國設計、中國製造、中國建造」，成為中蒙產能合作的標誌性工程；2017年，中方援建了七所學校和一所幼兒園，惠及蒙古偏遠地區的教育事業；2018年，又相繼實施了蒙古口岸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烏蘭巴托納萊河區兒童醫院設備援助項目、殘疾兒童發展中心項目以及烏蘭巴托市雅爾瑪格立交橋項目。為紀念2019年中蒙建交七十周年，中方建成了高速公路、省際公路、學校、幼兒園和殘疾兒童中心等一批現代化基礎設施，並正式移交蒙古使用。這些項目涵蓋了交通、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多個民生領域，體現了中國對蒙古援助從單一生產領域向綜合民生服務的轉變。

這些項目僅僅是中國對蒙古援助的冰山一角，許多項目需要派遣大量中國工人赴蒙工作，這意味着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工人前往蒙古。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援助蒙古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新的啟示。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歷史的教訓可以為現實提供鏡鑒。當年中蒙兩國在派遣工人問題上的種種糾葛，無論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今天處理類似問題時不可多得的參照。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中蒙關係史的研究一直頗受關注。相關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後大量湧現。1945年以前的

研究多集中在清末民國時期的論述，而圍繞1945年外蒙古獨立的專題探討也相對集中。¹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研究重心逐漸轉向現實性課題，如中蒙經貿關係等。²儘管如此，從整體來看，中蒙關係史研究長期處於相對滯後的狀態。這種滯後既與檔案資料的封閉有關，也與學術界對這一領域的重視程度不足密切相關。相較於中美、中日、中蘇關係等「顯學」，中蒙關係史研究長期處於邊緣位置。

冷戰結束之前，國內學術界對於新中國成立後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蒙關係多保持沉默，刻意迴避相關話題。³同時，國際學術界對中蒙關係史的研究也相當薄弱。在冷戰時期，中、蘇、蒙三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寥寥無幾，且主要集中於對蒙古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介紹，或是對中蒙關係現狀與未來走向的分析。⁴這些論著普遍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政治性明顯強於

-
- 1 師傳：《外蒙古獨立內幕》，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孫才順：《外蒙古獨立過程述評》，關貴海、樂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第二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陳謙平：《國民政府派員觀察外蒙古獨立公民投票始末》，《鍾山風雨》，2003年第4期；方美玲：《雅爾塔協定和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1期。
 - 2 咬亮：《解析中蒙經貿格局及其優化路徑》，《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7年第4期；保建云：《中蒙國際貿易依存度比較分析》，《東北亞論壇》，2007年第5期；恩和：《世紀之交的中蒙經貿關係：現狀與展望》，《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馬立國：《二十一世紀初中蒙關係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 3 至少公開出版物是這樣的，如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筆者在中國知網學術期刊電子庫中以「蒙古」和「中蒙」兩個關鍵詞搜索1990年以來的研究成果（2018年12月），結果共24247條。其中主要內容是蒙古現狀的研究，涉及中蒙關係歷史的文章，多數是中蒙經濟貿易研究或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歷史研究，從1950年代到1970、80年代的中蒙關係的研究成果較少。
 - 4 蘇聯研究成果有：Капица М.С. БНХАУ-гучин жилд гурван бодлого, УБ, 1984; [蘇]伊·亞·茲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陳大維譯，北京：時代出版社，1952年；[蘇]馬斯聯尼柯夫：《蒙古人民共和國》，湯藍之譯，北京：時代出版社，1950年；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蒙古人民共和國》，上海：三聯書店出版，1956年；蘇聯科學院、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蘇]伊·亞·茲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綱》，陳大維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72年。蒙古研究成果有：[蒙]恩·札格瓦拉爾：《蒙古人民共和國》（老蒙文），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烏蘭巴託，1958年；Лигдэн Б. БНМАУ-ын гадаад харилцааг хөгжүүлэх талаар МАХН-аас явуулсан үйл ажиллагаа, 1945-1970, УБ, 1976; МАХН үүсч хөгжихөд олон улсын коммунист хөдөлгөөний тусламжийн роль ач холбогдол, УБ, 1978。中國的研究成果有：樞原：《蒙古人民共和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內蒙古大學蒙古研究所：《蒙古人民共和國概況》，內部刊物，1976年；戈更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蒙關係》，《蒙古問題研究》，1988年第1—2輯；娜琳：《中蒙貿易簡況》，《蒙古問題研究》，1985年第1輯；許文益：《中蒙關係的過去與今後的發展》，《蒙古問題研究》，1987年第5輯；娜琳：《中蘇之間的蒙古》，《蒙古問題研究》，1987年第5輯；潘家琪：《周恩來訪問蒙古人民共和國》，《國際問題研究》，1960年第7期。

學術性，所引史料單一，且多依賴公開報刊與內部資料。此一時期，西方學者的研究同樣未能擺脫上述侷限，多從蘇聯和蒙古的視角出發，鮮少觸及中國方面的政策。¹ 這種單一視角的侷限，使得對中蒙關係的整體理解失之片面與不完整，也使得在國際冷戰史學界，中蒙關係長期處於被邊緣化的境地。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美國學者魯鵬（Robert A. Rupen）於 1964 年出版的《20 世紀的蒙古人》² 一書，是第一部涉及中國派遣工人援助蒙古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的中蒙關係史研究著作。該書於 2000 年被譯成新蒙文在烏蘭巴托出版。全書共分十章，詳細論述了從古代至 1963 年的中蒙關係，並對不同時期的中蒙關係進行了比較分析。作者認為，從古至今，中國對蒙古的政策總體上是相對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對蒙古採取了積極政策，不僅派遣了數萬工人赴蒙參與援建，還向蒙古提供了無償貸款，幫助其發展輕工業和農牧業經濟。通過經濟援助與發展合作，中國既加強了與蒙古的關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蘇聯對蒙古政治、經濟的控制。這一判斷雖屬宏觀，却觸及了中蒙蘇三角關係的核心命題。然而，該書對中國工人在蒙古勞動狀況的具體討論篇幅有限，且成書時大量檔案尚未解密，許多論述停留在推測層面。儘管如此，作者從獨特視角對中蒙關係及中國對蒙政策展開論述，在同時期著作中仍屬罕見，具有顯著的學術價值與參考意義。

冷戰結束後，隨着蒙古、中國和俄羅斯相關檔案的陸續解密與披露，歷史學者逐漸發現，早期關於中蒙關係的研究存在諸多缺陷與片面性。得益於此，有關中蒙關係史以及蒙蘇關係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涵蓋中蒙外交關係史³、

蒙古近現代史¹ 以及中蒙蘇三國關係² 等領域。這些研究無論在史料的豐富性上，還是在視角的多元化上，都較冷戰時期的著作有了顯著提升。

在這些研究中，蒙古國學者特別關注中國對蒙古的經濟援助以及援建工人問題。1999 年，博格澤扎布（Л. Бэгзжав）在烏蘭巴托出版了《中蒙關係（1949 — 1999）》一書，³ 將兩國關係劃分為全面發展期（1949 — 1962）、關係惡化期（1963 — 1989）以及蒙古社會轉型後的中蒙關係（1990 — 1999）三個階段，詳細探討了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兩國外交、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議題。作者認為，中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主要受國內政治和政策變動、中蘇關係及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的影響；而蒙古的外交政策則取決於其能否保持獨立自主。這一分析框架雖不無粗疏，却為後續研究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的分析路徑。2003 年，蒙古國出版的《蒙古國史》⁴ 第五冊，再度深入論述了中蒙建交、1950 至 1960 年代中國對蒙古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援助及其影響，以及兩國關係惡化的原因，成為繼《中蒙關係》之後又一部系統涉及該課題的重要著作。這兩部著作代表了蒙古國學術界從自身立場出發理解中蒙關係的努力。

1990 年，中國台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藍美華出版了《澤登巴爾時期外蒙古與中共的關係（1952 — 1984）》一書。⁵ 全書分五章闡述了蒙古發展情形、蒙中關係迅速發展、蘇聯重新加強對蒙古控制及中蘇關係惡化、中蒙關係全面惡化以及走向正常化的過程。在第二章中，作者簡述了蒙古引進中國工人的原因、各年份派遣工人的數量及中國提供的資金援助，結論部分亦論及中

1 西方學者專著有：Balazs Szalontai, Tsedenbal's Mongolia and Communist Aid Donors: a Reappraisal, IAS Newsletter # 35, November 2004; Sergey Radchenko, The Soviets' Best Friend in Asia: The Mongolian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CWHIP, Working Paper, no.42,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2003.

2 Рупен А., Хорьдугаар зууны монголчууд, УБ, 2000.

3 Болдбаатар Ж., Батбаяр Ц., 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ны түүхийн зарим асуудал, УБ, 2011; Монгол улс шинжилэх ухааны академи олон улс судлалын хүрээлэн, Монголын улс төрийн гадаад харилцааны түүх, 1911-1999, УБ, 2012.

1 [蒙]巴圖賽汗：《蒙古成為主權國家之路（1911 — 1946）》（老蒙文），內蒙古新聞出版社，2009 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蒙古人民共和國史》（老蒙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蒙]其木格：《蒙古獨立與蒙中俄關係（1911 — 1945）》，台北：幸福綠光出版，2016 年。

2 Батбаяр Ц., Монгол ба их гүрнүүд хх зуунд, УБ, 2015; Столыпин А. Москва, бээжингийн завсар дэхь монгол орон, УБ, 2000; Лузянин С.Г. XX Зууны эхний хагас дахь орос、монгол、хятад: 1911-1946оны улс төрийн харилцааны асуудал, Болдын Доржханд Орчуулсан, УБ, 2015.

3 Бэгзжав Л. 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 1949-1999, УБ, 1999.

4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үүх (Vботь), УБ, 2003.

5 藍美華：《澤登巴爾時期外蒙古中共的關係（1952 — 1984 年）》，台北，蒙藏委員會編印，1990 年。

國撤回工人的原因。藍美華認為，蒙古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中蘇關係影響，但蒙古在處理與中共關係時仍具有一定主動性，並非完全依附蘇聯。這一判斷突破了將蒙古簡單視為蘇聯「附庸」的傳統認知，為研究中蒙關係提供了多角度的視野。該著的價值在於，它提醒研究者注意在看似被動的小國中，同樣存在着能動的主體性。

在中國大陸，相關歷史著作和學位論文中也有部分內容涉及對蒙古的經濟援助與派遣工人問題。例如，裴堅章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¹、孫一先的《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²以及海濤的碩士學位論文《冷戰時期蒙古國外交策略研究（1945—1965）》³等，均觸及這一主題。其中，孫一先的著作以其親歷者的特殊身份，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和感性認識，儘管這些記述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和時代侷限。

近年來，利用最新解密檔案撰寫的專題論文相繼發表。一些中國學者藉助外交部解密檔案，從中國視角考察了新中國成立至1965年間的中蒙關係，普遍認為在中蒙關係惡化過程中中國處於被動應對地位，而蒙古的主動政策係受蘇聯指使。⁴其中，谷繼坤利用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和地方省級檔案，發表了《中國工人「赴蒙援建」問題的歷史考察（1949—1973）》⁵一文，對派遣原因、過程、工人數量及中蒙工人間的衝突等作了較為詳細的分析。然而，該文在探討中蒙關係時，缺乏從中蘇關係與意識形態爭論的視角出發，深入論述這些因素對中國工人回國情況的具體影響。更為重要的是，該文所依據的檔案資料基本限於中方一側，缺乏蒙古國檔案的印證和補充，使得論述的

完整性受到制約。陳弢在《中蘇分裂與中蒙關係（1960—1966）》¹一文中，利用中國外交部和民主德國外交部的檔案，研究中蘇分裂背景下中蒙關係的發展，認為在意識形態爭論與中蘇分裂背景下，蒙古的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並非完全受制於蘇聯。這一觀點與藍美華的判斷遙相呼應，進一步豐富了學界對蒙古外交行為複雜性的認識。然而，上述兩篇文章均未使用蒙古國的原始檔案，這一不足限制了研究的全面性與深度。缺乏蒙古國檔案的中蒙關係史研究，如同只聽取一方的證詞而作出裁判，其結論難免失之偏頗。

蒙古國學者近年也逐漸關注中蒙關係史，撰寫了一些介紹中國工人參與蒙古生產建設的文章。²部分蒙古留學生在華攻讀學位期間，也從事了相關研究。³2015年，蒙古學者那仁吉日嘎拉在內蒙古大學提交了博士論文《中國工人援蒙建設研究（1949—1964）》，⁴利用大量蒙古國中央檔案館和對外關係中央檔案館的檔案，全面探討了中國援建工人赴蒙從事生產建設的各個方面。該論文的重要貢獻在於，它首次系統運用了蒙古國方面的檔案資料，為這一課題的研究開闢了新的史料來源。其不足之處在於，對中國援建工人赴蒙過程僅進行了梳理，缺乏深入的史料分析，史料堆砌現象較為明顯，且未能從中蒙外交關係、中蘇關係及意識形態角度系統分析派遣背景與原因，致使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欠缺。

上述關於中國工人援蒙生產建設的研究成果，普遍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陷，即未能明確區分「中國工人」與「中國援建工人」（也稱「援蒙華工」）這兩個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谷繼坤在《中國工人「赴蒙援建」問題的

1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
2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
3 海濤：《冷戰時期蒙古國外交策略研究（1945—1965）》，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4 石紹湘：《中蒙關係分析（1949—1965）》，外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蒙]扎雅：《蒙中友好關係述論（1949—1966）》，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5 谷繼坤：《中國工人「赴蒙援建」問題的歷史考察（1949—1973）》，《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4期。

1 陳弢：《中蘇分裂與中蒙關係（1960—1966）》，《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5年第4期。
2 Өлзийбаатар Д., БНМАУ-ын их бүтээн байгуулалтын ажилд хятад ажилчид оролцсон нь 1955-1965 он, 《中蒙歷史學研究文集》編委會：《中蒙歷史學研究文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年。
3 [蒙]拉布哈道爾吉：《內蒙古人民革命黨與蒙古人民革命黨關係若干問題研究》（老蒙文），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4 [蒙]那仁吉日嘎拉：《中國工人援蒙建設研究（1949—1964）》（老蒙文），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歷史考察（1949—1973）》一文中，將「中國援建工人」的工作時間延續至1973年，這一說法實際上並不準確。根據1955年4月7日中蒙兩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工人參加蒙古人民共和國生產建設的協定》，所謂「中國援建工人」特指依據該協定派遣到蒙古工作的中國工人。隨着中蒙關係惡化，這批援建工人於1964年4月至7月間全部撤回中國，標誌着「中國援建工人」這一歷史階段的終結。因此，該群體的工作時間應界定在1955年至1964年之間，而非延至1973年。在此期間，中國援建工人主要參與了蒙古基礎設施的生產建設。與之相對，「中國工人」則泛指在蒙古從事工作的普通中國工人。據現有檔案，中蒙建交後最早的中國工人於1952年由中國駐蒙建築工程公司和華直公司駐蒙建築處等中國企業從國內聘用，至1959年在蒙古工作的中國工人多達7000餘人，¹ 1962年時約5000餘人。² 隨着「中國援建工人」回國，中國又派遣了3700餘人赴蒙繼續完成未竟的建築項目。³ 這些留蒙工人雖然繼續從事建設工作，但其法律身份和管理方式已與之前的「援建工人」截然不同。

此外，兩類工人在蒙古的管理機構也存在明顯差異。「中國工人」由中國駐蒙建築公司和華直公司直接管理，這些公司與蒙方機構並無直接聯繫；而「中國援建工人」則由蒙古政府設立的中國工人事務局負責管理，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中國工人事務處僅起輔助作用，他們與蒙方人員接觸頻繁。日常工作和生活受到蒙方更為直接的管轄。因此，1964年後《人民日報》和《國際共運參考資料》中的相關內容，⁴ 以及谷繼坤文章中的部分敘述⁵，將「中國工人」

與「中國援建工人」混為一談。谷文雖在邏輯上看似嚴密，但細加考辨便不難發現其中包含諸多史實錯誤，這主要源於作者對該歷史時期具體情形了解不足，以及單一依賴中國檔案資料進行研究之侷限。由此亦可見，概念界定的清晰與否，直接影響着歷史敘述的準確性和研究結論的可信度。

綜觀以往研究，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在於，每當中蒙關係出現意見分歧與矛盾時，國內學者往往傾向於將責任歸咎於蒙古方面。當中國援蒙工人與蒙古工人發生衝突時，研究結論通常認定蒙古工人有錯在先，並指責蒙方包庇本國工人，而幾乎不考慮中方可能存在的問題。這種現象，可能源於中國學者的自然立場，或因主要依賴單方面檔案材料使然。然而，歷史研究的天職在於還原真相，而非為任何一方辯護。如果研究者不能超越自身的國族立場，以客觀審慎的態度檢視史料，那麼其所得出的結論便難以經受時間的檢驗。

與此同時，語言障礙亦是蒙古學者與中國學者共同面臨的難題。蒙古國學者通常不諳中文，極少利用中文檔案；中國學者亦不熟悉蒙文（包括新蒙文和老蒙文），很少直接使用蒙文檔案。這種語言隔閡使得國內外學者鮮能同時利用雙方或多國檔案史料進行研究，即使偶有引用，也多是轉引他人的註釋。這極易導致研究觀點的偏頗，影響研究的準確性與深度。環顧國際學術界，凡屬成熟的史學研究領域，無不是多國學者在多語種檔案基礎上進行對話與交鋒的結果。中蒙關係史研究要走向成熟，就必須突破語言的壁壘，實現史料的互補與觀點的交融。

儘管國內外學界對新中國成立後的中蒙關係已取得若干初步成果，但所探討的問題仍相對單一且缺乏深度。中蒙關係的歷史中依然存在許多未解之謎，亟待更多研究者深入發掘。以中國派遣工人參與蒙古社會主義生產建設為例，許多重要細節尚未得到充分探究，如中國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生活與工作實況、涉及中蒙兩國的司法問題等，均存在明顯的研究空白。這些空白不僅是學術上的缺憾，更構成了我們全面理解這段歷史的障礙。

基於上述學術史梳理，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這一課題進行更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以填補現有之不足，並為中蒙關係史提供更為翔實的學術積累。

1 《列夫金等與謝甫生會談紀要：關於援助蒙古的問題》，1959年10月22日，АВІРФ, ф.0111, оп.41, пор.10, пап.260, л.25-33；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959.11—1962.12）》，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37頁。

2 《周恩來總理同蒙古澤登巴爾主席第二次談話記錄》，1962年12月27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3159-03，第30-43頁。

3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四十八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頁。

4 《我援蒙工人奮戰洪水搶救蒙人民受到蒙人民普遍讚揚》，《國際共運參考資料》1966年7月22日，第7頁。

5 谷繼坤：《中國工人「赴蒙援建」問題的歷史考察（1949—1973）》，《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本書所依據的檔案文獻，主要來自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國內蒐集的檔案資料。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自 2004 年起對外開放，雖開放程度未盡理想，但已解密的中方檔案中，仍有部分涉及中蒙關係，主要包括談話記錄、往來電報、情報資料彙編與工作報告等。這些原始文件對中蒙關係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其開放的時間範圍亦恰與本研究時段相合。此外，筆者在中央檔案館及多個省市縣級地方檔案館——包括河北省、河南省、江蘇省、山西省、山東省、內蒙古自治區、北京市、上海市、呼和浩特市、濰坊市、饒陽縣、臨朐縣、清苑縣等檔案館——蒐集到大量涉及中國派遣工人參與蒙古生產建設的檔案資料，為從地方視角審視這一歷史進程提供了珍貴素材。這些地方檔案的價值在於，它們記錄了從中央決策到基層執行的全過程，呈現了政策在層層傳遞中發生的變形與調適。

自 20 世紀 90 年代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外交部檔案館、中央檔案館、世界知識出版社等機構陸續出版了多種檔案文獻集、文集、文稿、年譜、文選、選集和文獻選編。這些出版物收錄了大量涉及中蒙關係的檔案，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原始檔案開放之不足。其中尤為重要的包括《毛澤東外交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檔案：1949—1955》以及《1949—195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等。與此同時，筆者還參閱了若干由政府部門編印的內部材料，如中聯部的《各國共產黨簡況》《各國共產黨動向》《兄弟黨和兄弟國家報刊材料》，中宣部的《宣傳動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外事工作通報》，外交部的《外事動態》，新華社的《國際共運參考資料》《內部參考》，以及《人民日報》《內蒙古日報》等報刊資料。這批文獻信息量豐富，為理解當時政策背景與輿論環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參考，也使研究者得以在官方宣傳與內部討論之間形成對照，捕捉到公開話語與私下研判之間的張力。

其二，筆者在蒙古國蒐集的檔案材料。相較於中國，蒙古國檔案館的開放程度更高，除少數內容禁止外國學者查閱外，大多數檔案已對外開放。蒙古國外交部中央檔案館解密了大量檔案文件，開放至 2000 年，其中涉及中

國的卷宗超過 300 卷，內容涵蓋中蒙兩國領導人談話記錄、外交部與駐華大使館往來電報、有關中國問題的情報資料彙編及工作報告等。這些文件對中蒙關係史研究至關重要。不過，近年來該館開放程度有所收縮，部分卷宗目錄——如中蒙邊界及高層談話記錄——已難以查閱，但絕大部分檔案仍可利用。¹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檔案館保存了 200 餘卷涉及中國的檔案，時間跨度為 1921 年至 1990 年，包括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會議記錄與總結報告。蒙古國中央檔案館館藏尤為宏富，收藏了自 1674 年以後的各省檔案，其中涉及中國的卷宗約 2000 卷（目前尚無精確統計）。與外交部中央檔案館相比，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檔案館與蒙古國中央檔案館的開放狀況更為理想，除個別高層領導人檔案尚未對外開放外，其餘均可查閱與複印。上述檔案構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² 這些蒙古國檔案的價值在於，它們為研究者提供了蒙方的視角和內部討論記錄，使得許多僅從中方檔案中無法得知的決策過程和行為動機得以呈現。

此外，筆者還蒐集了一批公開出版的蒙古方面資料，包括蒙古領導人講話與著作、蒙古人民革命黨會議文件、外交文件集、黨的文件彙編、年譜、傳記、蒙古國駐華大使館館藏檔案影像集，以及蒙古人民革命黨機關報《真理報》等。2016 年至 2017 年初在蒙古國國立大學留學期間，筆者查閱並蒐集了上千件冷戰時期中蒙關係史相關的蒙古國檔案資料，為深入理解蒙方立場與決策邏輯奠定了檔案基礎。留學期間的檔案蒐集工作，不僅使我獲得了第一手的研究素材，也使我有機會切身感受蒙古社會的氛圍，這種感性的認知與理性的學術研究相得益彰。

其三，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蒐集整理的檔案資料。該院歷史學系主任、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

1 詳見白林：《蒙古國外交部檔案館館藏中蒙關係資料評介》，《中共黨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17-123 頁。

2 詳見白林：《蒙古國檔案總局館藏中蒙關係檔案評介》，《中共黨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21-126 頁。

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蒐集及歷史研究」（項目號：15@ZH009）之子課題「蒙古國檔案蒐集整理與歷史研究」，已系統整理了與蒙古關係密切的俄國（蘇聯）、德國（民主德國）等國家的解密檔案，其中涉及中蒙關係的內容相當豐富。沈志華教授還組織翻譯團隊對相關俄文、德文檔案進行了翻譯。這些多國檔案的彙集與譯介，為筆者從更為寬廣的國際冷戰史視角審視本課題提供了極大便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檔案的引入使得中蒙蘇三國關係的互動圖景得以完整呈現，使得研究者能夠擺脫雙邊關係的侷限，從多邊互動的角度把握歷史的全貌。

其四，個人文獻與口述資料。主要包括參與援蒙工作的中國領導人及派遣至蒙古的中國工人的日記、年譜、回憶錄和口述記錄，如《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楊尚昆日記》《在大漠那邊 —— 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親歷 1960 年代援助蒙古國維修古建築》以及《高耀祖口述：為蒙古建設陶瓷廠》（載《景德鎮文史資料 —— 草鞋碼頭的變遷》第 13 輯上冊）等。這些帶有親身經歷溫度的史料，使研究者得以在官方檔案之外，捕捉援建工人及其管理者的個體經驗與微觀感受。如果說官方檔案記錄了歷史的骨骼，那麼這些個人文獻則賦予了歷史以血肉和溫度，使那些冰冷的數字和抽象的政策獲得了具體的面相。

其五，公開出版的論著。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富，此處不再逐一一列舉。上述多源檔案文獻相互參證，共同構成了本書立論的史料基礎。正如歷史學家所強調的，單一檔案只能提供歷史的碎片，唯有多種來源的史料相互印證，才能拼合出相對完整的歷史圖景。

對於本書而言，通過考察 1949 年至 1964 年間中國派遣工人參與蒙古生產建設的歷史課題，可以深入探討以下四個問題。

其一，中蘇關係的變動如何在深層牽引中蒙關係的走向。新中國成立後，蘇聯率先予以承認並建交，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亦隨之跟進。二戰後，蒙古在蘇聯援助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1948 — 1952），新中國則着手恢復國民經濟。建交初期，受多重因素制約，中國並未向蒙古提供實質性經濟援助。1955 年，中蒙簽訂派遣工人協定，中國開始向蒙古的第二個五年計劃

（1953 — 1957）輸出大批勞動力；次年，兩國簽訂經濟技術援助協定，中國承諾提供 1.5 億盧布的無償援助。此後，蒙古在政治和外交上嘗試奉行對中蘇「等距離」政策，經濟上則一度呼應中國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1960 年，《中蒙友好互助條約》和《中蒙經濟及技術援助協定》相繼簽署，中國又向蒙古提供 2 億盧布的長期貸款，雙邊關係進入短暫的「蜜月期」。然而，中蘇分裂加劇後，蘇聯大幅增加對蒙援助，蒙古迅速向蘇聯靠攏。至 1964 年中國援建工人全部撤回，中蒙關係終告破裂。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經濟援助究竟是意在爭取蒙古以牽制蘇聯，還是暗含着更為複雜的戰略意圖？中蘇關係與中蒙關係的波動究竟是同步共振，還是存在錯位與滯後？這些均需在多邊檔案的對讀中加以深究。

其二，如何穿透意識形態話語，真切理解中國政府向蒙古派遣工人的深層動機及其複雜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向周邊社會主義國家派遣工人與提供經濟援助，固然是擴大國際影響、輸出革命經驗的普遍做法，但面對蒙古，中國領導人心中還盤桓着另一層特殊情結 —— 蒙古曾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毛澤東等領導人並未從內心放棄「大一統」的歷史願景。儘管斯大林通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迫使中國承認蒙古獨立，但毛澤東始終未曾放下收復舊疆的念想。隨着中蘇關係起伏，他多次向蘇聯領導人試探收復蒙古的可能性，均遭嚴拒。在此背景下，大規模派遣工人赴蒙，並試探性地提出讓中國工人長期定居，便成為一種隱晦而現實的對蒙策略。然而，蒙古領導人對此深懷戒備，在派遣漢族工人還是蒙古族工人的問題上，雙方產生明顯分歧。由此引出一系列尚待釐清的關鍵問題。1950 年，中蒙雙方何以突然就派遣中國工人展開協商？動議究竟由誰率先提出？至 1954 年中方再度提議派遣時，其出發點發生了怎樣的偏移？圍繞工人民族成分的爭執，折射出雙方在民族國家構建與安全認知上何種根本性的差異？

其三，中蒙雙方在工人派遣的具體數目與分配方式上，為何始終難以達成一致，其間又隱伏着怎樣的信任危機。1955 年中國援建工人抵蒙後，蒙古政府專設管理機構，但在實際分配中却傾向於將工人分散安排至各省和各企業單位，此舉引發部分中國工人不滿。在漢族工人與蒙古族工人的選用問題

上，雙方決策層的張力同樣持續存在。儘管如此，絕大多數中國工人仍以高度國際主義精神投入生產，基本完成乃至超額完成蒙方企業的任務，並因此贏得蒙古領導層的讚譽。然而，與同期在蒙的蘇聯技術工人及蒙古本國工人相較，中國工人的生活條件與工作待遇始終明顯偏低。蒙古政府雖試圖加以改善，收效却十分有限。這一局面的形成，與中蒙雙方政策的錯位以及蒙古高層決策同中下層執行之間的落差密不可分。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雙方在工人數目與分配上的分歧，其根源究竟何在？蒙古在引進七千餘名工人後為何一度中止引進？將中國工人分散配置，是出於管理效能的考慮，還是蘊含着更深的政治戒備？中國工人待遇長期偏低，為何遲遲未能得到實質性改善？

其四，如何客觀評判中國援建工人全部回國的原因及其歷史後果。縱覽 1955 年至 1964 年中國工人赴蒙工作的全程，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每年均有一定數量的工人因期滿或其他原因提前回國，且後期回國人數呈遞增之勢。工人期滿回國的幾個高峰 —— 1958 年、1961 年、1962 年、1963 年 —— 恰與中蒙關係的不同波動階段吻合。1958 年期滿之際，中蒙雙方為維繫合作而積極動員工人續約留蒙，最終僅千餘人返國。此後，隨着中蘇關係急劇惡化，中蒙關係全面下滑，1961 年至 1963 年間，數千工人期滿後陸續撤回國內。1964 年，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書記澤登巴爾突然決定遣返全部在蒙中國工人，這一決策成為中蒙關係走向破裂的標誌性事件。此處亟須辨析的是：澤登巴爾為何在此時驟然作出全面遣返的決定？其動機究竟是意圖徹底割斷與中國的政治聯繫，抑或更多源自國內經濟調整、勞動力替代乃至蘇聯壓力的複合作用？這一決策與蒙古國內政治動態又有何種內在關聯？

總而言之，由於外蒙古是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中蒙關係有着特殊的歷史淵源，由於蘇聯對蒙古的控制，中蒙關係又是中蘇關係的附屬品，於是，中國工人援建蒙古的過程，就這樣意外地開始，又意外地結束了。

目錄

叢書總序 / 沈志華	i
序 言	iv
第一章	001
中國援建工人的交涉與派遣歷程	
第二章	082
中國援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	
第三章	142
中國援建工人的回國過程	
第四章	213
中國經濟援助與中國援建工人的成效	
結 語	277
附 錄	289
參考文獻	312
後 記	324

第一章 中國援建工人的交涉與派遣歷程

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蒙古人民革命黨（以下簡稱蒙古黨）和中國共產黨分別於 1921 年成立。在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和中國國內局勢下，中蒙兩黨互相支持與合作。蒙古黨通過協助共產國際，多次利用蒙古領土向中國共產黨運輸和提供戰略物資，支持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同樣，中國共產黨也對蒙古的獨立表示支持。然而，隨着國共內戰局勢的變化，中共領導人開始重新思考並調整了對蒙古獨立的態度，試探性地表達了收復蒙古的意圖。在蘇聯的堅決反對下，中共的這一願望未能實現，這一態度也影響了中蒙兩國關係的發展。

中蒙建交後，兩國在外交和貿易等領域一度陷入停滯。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後，中蒙兩國的貿易關係才開始有所發展，但有關中國派遣工人援建蒙古的談判卻暫時中斷。朝鮮戰爭停戰後，中蒙雙方代表團再次就派遣中國援建工人的問題展開談判，並於 1955 年 4 月 7 日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工人參加蒙古人民共和國生產建設的協定》，中方決定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工作。

在派遣中國援建工人的問題上，中國領導人表現得十分積極主動，特別是毛澤東提出了未來向蒙古輸送數十萬漢族人口「移民」的構想。然而，中蒙兩國領導人在派遣工人的民族構成問題上存在分歧。蒙古領導人希望引進大量來自內蒙古的蒙古族工人和農牧民，而拒絕漢族人大規模移民蒙古。與此相反，中共領導人堅持只派遣漢族工人，拒絕從內蒙古輸送蒙古族人到蒙古。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始終堅守立場，並未做出任何妥協。

隨着中蘇關係的惡化，中蒙關係逐漸惡化，中國援建工人不得不提前或在期滿後回國，中方也停止了向蒙古派遣工人。因此，在蒙古工作的中國援建工人人數降至歷年最低點。最終，蒙古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完全倒向蘇聯。1964年，所有中國援建工人全部回國，至此歷時9年的中國援建工人援助蒙古生產建設的歷程宣告結束。

第一節 中蒙關係的歷史背景與發展演變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中，中蒙兩黨曾互相支持與協助。蒙古黨為中共培養政治和軍事幹部，中共支持蒙古獨立並要求北京政府承認其獨立的合法性。「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後，中共支持蒙古獨立的態度已逐漸發生轉變。1928年共產黨主動向蒙古黨提出了兩黨之間建立關係的建議。1929年中蒙雙方代表開始談判正式建立兩黨關係的事宜，因中共黨內在是否支持蒙古獨立問題上出現分歧，從而並未能實現兩黨建立關係的目標。1935年毛澤東確立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以後，中共改變了以往支持蒙古獨立的態度。但在當時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中共還不得不公開發表支持蒙古獨立的文章。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共領導人開始與蘇聯磋商收復蒙古的問題，斯大林和之後的蘇聯領導人對此都斷然拒絕。因此，中蒙建交初期，兩國關係十分冷淡。

一、20世紀20年代中蒙兩黨關係的起源與發展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1920年恩琴男爵領導的白俄殘軍被蘇俄紅軍擊敗，逃往蒙古和中國東北。他們隨後打敗了北洋政府駐蒙古的陳毅軍隊，佔領了庫倫（1924年改稱烏蘭巴托）。1921年2月，恩琴挾持哲布尊丹巴活佛自稱蒙古皇帝，並宣佈蒙古「獨立」。恩琴軍隊進入庫倫後，

肆意搶掠蒙古牧民的牲畜和財物，這些暴行激起了蒙古上層和普通牧民的極大憤慨。

與此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迅速傳入蒙古，激發了蒙古青年們的革命熱情。不久，由蘇赫巴特爾¹和喬巴山²分別領導的兩個共產主義革命小組在蒙古國內成立。1920年6月，這兩股革命力量合流，並派出以喬巴山為首的代表團前往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尋求援助。共產國際隨後同意為蒙古提供資金和武器支持。³

當時，日本利用恩琴匪軍佔領蒙古和謝米諾夫領導的沙俄殘餘軍隊在中國東北的勢力，企圖建立一個內外蒙古統一的「泛蒙古主義」大蒙古國，⁴以應對蘇俄在遠東地區建立的遠東共和國。這對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構成了巨大威脅，因此消滅佔領蒙古的恩琴匪軍成為了共產國際的一項重要任務。⁵

1921年3月，蒙古革命領導小組在恰克圖召開了會議（即蒙古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成立了蒙古人民黨（1925年改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⁶會議確定了當前的主要任務：驅逐中國軍閥，消滅以恩琴為首的白俄匪軍，恢復蒙古的「自治」。同年7月，在蘇俄紅軍的幫助下，蒙古人民革命軍成功擊敗了恩琴領導的白俄匪軍，並成立了君主立憲制的人民革命政府。11月5日，蘇俄政府與新成立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簽訂了

1 蘇赫巴特爾（1894—1923）是出生於蒙古車臣汗部一個貧窮家庭，1911年應徵服兵役，蒙古自治取消後在俄蒙印刷所充當工人並開始了革命工作，1921年成為蒙古人民革命領袖，擔任蒙古人民革命軍司令等職務，1923年逝世。

2 喬巴山（1895—1952）出生於蒙古車臣汗部貧困家庭，1919年開始積極參加革命工作，1920年赴蘇俄求援，1936年獲得蒙古人民共和國元帥稱號，1937年任蒙古人民軍總司令和國防部長，後任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和部長會議主席，1952年1月在蘇聯去世。

3 喬巴山：《蒙古革命簡史》，謝再善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第22頁。

4 郭道甫：《蒙古問題》，第7頁。

5 РГАСПИ, ф495, on154, л105, л1; 轉引自〔俄〕盧賈寧：《中國與蘇維埃俄國之間的蒙古（1920—1924）》，阿拉騰敖其爾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5頁。

6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編輯部：《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呼拉爾、小呼拉爾和中央全會決議案》（老蒙文），烏蘭巴托，1946年，第22頁。

《俄蒙修好條約》，承認蒙古人民政府為蒙古唯一合法政府。對此，北京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¹

蒙古人民政府和蒙古黨的領導人清楚地認識到，蘇俄政府的承認只是暫時的，不能完全保障蒙古的獨立地位。因此，他們認為必須爭取中國及世界各國的承認，尤其是中國政府是否承認蒙古的獨立地位尤為重要。

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1919年5月4日，全國範圍內爆發了以學生為主的遊行示威，史稱「五四運動」。這場運動激發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對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和追求。1920年8月，中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成立。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和蒙古黨都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並因共同的思想理念和地緣政治背景而迅速建立了聯繫。然而，儘管如此，中蒙兩黨並未立即建立正式的黨際關係。

為了促使中國政府儘快承認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支持蒙古獨立。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周報》上發表文章，公開支持蒙古獨立。1922年9月27日²，《嚮導周報》第三期發表的文章《國人對蒙古問題應持的態度》明確表示，中國人民支持蒙古獨立，並反對那些不支持蒙古獨立的中國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³筆者在查閱中國和蒙古檔案史料時發現，這篇文章是關於中共支持蒙古獨立的最早文獻記錄。

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在題為《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的講話中，也闡述了他對蒙古問題的觀點。他認為，由於經濟、民族、語言等方面的差異，統一的政治體制難以適用於所有地區，因此應該積極承認蒙古獨立，並幫助蒙古人民推翻王公喇嘛的特權，實現真正的獨立。¹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勢力薄弱，影響力有限。為遏制日本北進、牽制張作霖的擴張以及保障蘇俄在中東鐵路的既得利益，共產國際一方面支持中國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在中國軍閥中尋找親俄勢力，提供軍事援助，以平衡各派軍閥的力量。其中包括吳佩孚、馮玉祥等人。然而，吳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勝利後，改變了對蘇聯的支持態度，轉而與蘇聯對立。到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馮玉祥發動政變，加入革命運動。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也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取得聯繫。1923年5月，由於陳炯明叛亂，廣州局勢動盪，孫中山在未能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援助的情況下，開始向蘇聯尋求支持，並表示支持蒙古獨立。在這種背景下，共產國際與孫中山建立了聯繫，並向國民黨提供了200萬盧布的援助。²

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蒙古黨中央派遣代表前往中國，與各方勢力交涉，探討他們對蒙古獨立的態度，這其中包括國民黨。為了試探國民黨的立場，1923年末至1924年初，蒙古黨中央派遣代表與國民黨領導人孫中山會談。蒙古黨代表還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交流。³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表達了對蒙古獨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蒙古應該獲

1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頁。

2 石紹湘：《中蒙關係分析（1949—1965）》，外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8頁。在石紹湘的論文中記載的時間「1922年7月27日」錯誤的，應該是「1922年9月27日」。因為《嚮導周報》是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創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是中國共產黨創立後第一份公開出版的刊物。1927年7月18日停刊。

3 《向蒙古提供中國革命領袖及報刊支持蒙古革命的材料事》，1953年8月28日—9月29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6-00039-03，第12-35頁。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94-199頁。

2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頁。

3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頁。

得合法獨立的國家地位，因為這有助於推動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革命運動。

李大釗指出，蒙古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對象一致，且雙方力量較為薄弱，需要與其他反帝反軍閥勢力合作，擴大自身的影響。¹在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承認蒙古獨立地位問題上存在分歧，導致兩黨之間產生矛盾。1924年5月，蘇聯政府與北京政府簽訂了中蘇協定，蘇聯在該協定中承認了中國對蒙古的主權。一些中國共產黨員認為，北京政府故意拖延承認蒙古獨立的合法性，他們在公開文章中批評北京政府，認為蒙古在經濟、語言和民族歷史等方面與內地不同，應該享有獨立權利。這一觀點引發了一些國民黨人士的強烈反對。

部分國民黨成員發表文章反駁共產黨的立場，抨擊共產黨為蒙古黨和蘇聯說話，並要求懲治那些支持蒙古獨立的共產黨員。²對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在《嚮導周報》上發表題為《我們的回答》的文章，反駁部分國民黨人的民族自救解放主張，支持民族自決權並鼓動蒙古脫離中國，同時抨擊軍閥出兵收復蒙古的主張。³

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為了支持內蒙古地區的革命運動並促進中國共產黨在當地的發展，蒙古黨大力支持內蒙人民革命黨的建立。1923年，蒙古黨召開會議，決定對中國、朝鮮、內蒙古和呼倫貝爾等地的民主運動提供物資援助。⁴為此，他們在海拉爾、張家口、天津等地設立了合

作社，表面上從事商業貿易，實際上作為援助這些地區的聯絡站。¹

與此同時，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青年在蒙古革命的影響下，民族革命運動逐漸活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親自前往北京蒙藏學校，對在此學習的蒙古族青年進行思想引導，鼓勵他們參與內蒙古地區的民族革命運動。1925年，李大釗派遣奎璧、趙誠、佛鼎等人前往蒙古黨政學校學習。²從1924年5月至1925年4月，共有44名蒙古青年被派往蒙古學習，其中多數為中國共產黨員。³

蒙古黨不僅為內蒙古革命運動培養了革命幹部，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大量的民族幹部。為了解決內蒙古革命運動迫切需要大量民族幹部的問題，蒙古黨中央召開專門會議，決定向內蒙古地區提供50個革命青年免費就讀蒙古軍事學校的名額，並提供5萬盧布的援助，立即撥款2萬盧布。⁴這標誌着中國共產黨與蒙古黨正式接觸的開始。

为了更好地發動和組織內蒙古革命運動，李大釗與國民黨員白雲梯等人進行了磋商，並着手準備在內蒙古建立黨組織。1925年末，中共中央批准了「蒙古問題決議案」，決定在內蒙古組建內蒙古黨，並計劃在張家口召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大會。⁵

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下，這一行動需要獲得北京政府、軍閥和國民黨等各方勢力的默許，特別是馮玉祥的同意，因為張家口處於他的勢力範圍內。一方面，李大釗親自前往張家口與馮玉祥會談，進行思想宣傳。

1 《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談話記錄》，1924年5月，МАХНА, ф.1, д.2, х/н.176, хуу.7; 轉引自 МАХН үүсч хөгжихөд олон улсын коммунист хөдөлгөөний тусламжийн роль ач холбогдол, УБ, 1978, хуу.227; Лхамсүрэн Б., Монгол, 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ны талаалрхи МАХН-ын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ч байр суурь, УБ, 1984, хуу.16.

2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6頁。

3 陳獨秀：《我們的回答》，《嚮導周報》1924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3-132頁。

4 《蒙古人民革命黨決議》，1923年，МАХНА, ф.1, д.2, х/н.2, хуу.11.

1 Жамсран Л., МАХН Өвөр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хувьсгалт нам үүсч бэхжихэд тусалсан нь, Монгол түүх судлалын өгүүллүүдII, УБ, 2003, хуу.122.

2 郝維民、其其格：《李大釗與內蒙古革命》；見中共內蒙古地區黨史研究所：《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9-250頁。

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所：《俄共密檔與中國革命史研究》（論文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8頁。

4 Жамсран Л., МАХН Өвөр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хувьсгалт нам үүсч бэхжихэд тусалсан нь, Монгол түүх судлалын өгүүллүүдII, УБ, 2003, хуу.122.

5 郝維民、其其格：《李大釗與內蒙古革命》；見中共內蒙古地區黨史研究所：《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二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3頁。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和蒙古黨中央派遣蒙古黨中央主席丹巴道爾吉前後兩次前往張家口與馮玉祥交涉，討論在當地建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事宜。

儘管最初馮玉祥由於擔心革命思想傳播到他的軍隊中，反對在張家口召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會議，但在丹巴道爾吉綜合運用共產黨國際承諾的軍事援助等恩威並施的策略下，馮玉祥最終同意了會議的召開。他派遣國民軍代表、察哈爾都統張之江於當年 10 月參加了會議。此外，國民黨元老李烈鈞、時任中共張家口地委宣傳委員江浩以及蒙古黨中央主席丹巴道爾吉等人也出席了會議。

在 1925 年至 1926 年間，蒙古黨多次派代表團到中國，與國民黨協商加強兩黨關係以及蒙古黨對中國革命運動的援助問題，同時與中共黨員進行了接觸。1926 年，中共和國民黨也派代表團赴蒙古進行考察。¹

總的來說，在 1924 年至 1927 年國共合作期間，蒙古黨與中共及國民黨之間的聯繫較為密切。然而，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規模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及革命羣眾，中國革命運動立即陷入低潮。對此，蒙古黨召開第六次會議，討論和總結中國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和經驗教訓，並決定加強與中共之間的關係。²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誌着共產國際支持的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失敗。這一事件直接導致蘇聯在遠東戰略和策略的轉變。蘇聯將注意力從中國內地和南方轉移到中國的邊疆民族地區，包括西藏、內蒙古和新疆。在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情況下，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慮國家安全

戰略，優先考慮國家安全利益，高於世界革命的階級利益和國際利益。¹ 這種戰略重心的轉移是在打着對他國勞動者提供國際共產主義援助的旗號下進行的，但在解決關鍵國際問題時，蘇聯仍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²

在這種背景下，蒙古的戰略地位愈發重要，斯大林開始加強對蒙古的控制，實施經濟集體化，並向蒙古提供軍事援助以增強其國防力量。同時，蘇聯減少了對中共的援助，甚至放鬆了對中共的控制。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共與蒙古黨之間的關係。

二、中共對蒙古獨立態度之轉變

隨着對國內共產黨力量的鎮壓加劇，中國國民黨對蒙古及其革命運動的態度也逐漸轉向敵視，蔣介石甚至揚言要派兵收復蒙古。³ 為應對此局勢，蒙古黨中央在 1928 年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決定，必須加快加強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並支持中國革命，以削弱中國國民政府對蒙古革命政權的威脅。⁴

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內部在蒙古獨立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一派主張繼續支持蒙古獨立，另一派則反對獨立，認為應伺機收復蒙古。1927 年末，部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共產黨員在致蒙古黨中央的信中提到，已對黨內反對蒙古獨立的黨員進行了嚴厲批評，並明確表示中共不僅反對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

1 蒙古《真理報》，1926 年 10 月 5 日。

2 Лхамсүрэн Б., Монгол, 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ны талаалрхи МАХН-ын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ч байр суурь, УБ, 1984, хуу.23.

1 Ватлин А.Ю. Коминтерн: первые 10 лет.-М.1993;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1917-1945гг. Поиски новых подходов.-М.1992.

2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Монголия-Кита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1911-1946гг. Москва: ОГНИ, 2003, с.156.

3 蔣介石：《蘇俄在中國》，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9 卷），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 年，第 28 頁。

4 МАХН -ын VII их хуралын тогтоол шийдвэрийн эмхтгэл, УБ, 1929, хуу.100-101.